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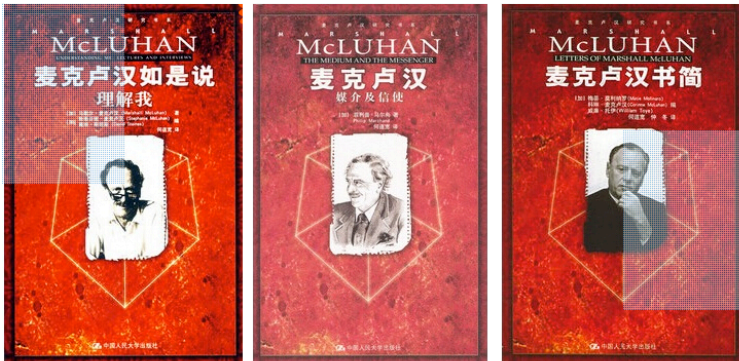
評

麥克盧漢的自我認知與媒介闡釋

《McLuhan's self-perception and media interpretation》

——圍繞「麥克盧漢研究書系」的再閱讀

史洪智 Shi HongZhi*



* 史洪智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Journalism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2011 級博士後，河南大學學報編輯部編輯。Email: hdxbszhz@163.com

加拿大大眾傳播理論家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是資訊社會的「先驅」和「先知」，電子時代的代言人。世紀之交，麥克盧漢在中國新聞傳播界聲名鵲起。他的媒介文化觀、「地球村」和「再部落化」、廣告文化批判、技術與視覺傳播等「超越現代思維定勢的後現代思維」，具有極強的洞察力、前瞻性和預見性，他深刻揭示媒介在數位變革時代對經濟、心理、社會和文化領域的深遠影響（何道寬，2001：23）。2003—2006 年，由何道寬先生主持的「麥克盧漢研究書系」，全面收錄菲力浦·瑪律尚著《麥克盧漢：媒介及信使》，梅蒂·莫利納羅等編《麥克盧漢書簡》，以及斯蒂芬妮·麥克盧漢、大衛·斯坦斯編《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分別為麥克盧漢的傳記、書簡和講演訪談錄。這套書系的出版，極大地突破此前依據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泰格龍《麥克盧漢精粹》語錄摘編、觀點概括的形式來理解麥克盧漢學術思想的局限，對於深入理解《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和《機器新娘：工業人的民俗》的寫作思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是全面理解他的學術思想和寫作思路的重要資料。

麥克盧漢作為這個時代最傑出、最富有創新精神的頭腦之一，任何圍繞他的質疑和稱頌、批判和反詰、解構與重組，都有必要重新返回「文本細讀」的研究起點。任何一位嚴謹的研究者，如果希望清晰地梳理出麥克盧漢的自我認知與媒介闡釋，不僅要熟記他的凝練概括的語錄，還要找到他獨特思維形成的脈絡。保羅·萊文森在《數字麥克盧漢》裡集納麥克盧漢 14 條警句，何道寬先生提煉「媒體延伸論」、「媒體冷熱論」、「媒體訊息論」，以及媒介環境學和東西方交流趨同思想，既將麥克盧漢的思想火花變成無數次被人引用的名言，也加大讀者理解他「空靈、飄渺、晦澀」的語言風格的難度。因此，傳記的刻畫生動、形象鮮明，書信的語言誠摯、感情細膩，講演訪談的針鋒相對、鞭辟入裡，為我們由此及彼、由易到難，深入理解他頭腦的創新源泉提供最佳的文本。

需要強調的是，麥克盧漢對偉大的書籍、事件和人物那種無窮無盡的熱情，加之不用常規的歷史或哲學方法研究媒介，以及不給自己論點提出證據的寫法，令我們閱讀他著作的過程在整體上呈現「碎片化」。本文寫作的基本想法，是把讀者的注意力先引向對麥克盧漢的個人觀察，再引向文本本身，避免如麥克盧漢所說，「我將把書放在讀者的面前，使之處在清晰的焦點，使其直接對讀者說話」（Molinaro, M., McLuhan, C. & Toye, W.,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222）。因為這樣的方式，

往往容易使缺乏相關知識結構和學識素養的讀者產生誤讀，並不能達到理解他的目的。

壹、青年時代的麥克盧漢

何道寬先生在《譯者前言》中，道出他深入挖掘麥克盧漢的學術轉向的濃厚興趣。他希望獲悉，這位書齋型的學者是怎麼一步步走向文化批評和社會批評？怎麼完成從文學到傳播的轉向、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的轉向？他從五個部分：毀譽參半、兩次熱潮、奇才怪傑、分裂人格、思想遺產，進行了比較詳盡的現代詮釋。本文通過細緻的文本閱讀，試圖繼續做一點挖掘的工作，特別是找到屬於青年時代麥克盧漢極其特殊的氣質和性格。根據傳記、書簡的內容，可以概括他在心智、讀書、社交、教育、學者命運等五個方面的過人稟賦：

第一，青年的麥克盧漢「天生討厭精神錯亂和不能自製的那一套東西」。精神錯亂表現為一種迷惑狀態，不適宜的動作或反應，難以快速地思考和協調運動。亞里士多德則將自製與不能自製、堅強、軟弱和柔弱等與人的心理意志相關的品質，視作介於德性與惡之間的品質。麥克盧漢強調心思穩定和有效自製，這鼓勵著他不斷進取，哪怕有 100 種消遣的誘惑也不動搖；平凡的腦袋無論受到什麼奇怪動機的刺激，都會思考超越平凡的事情（Molinaro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95）。

第二，青年的麥克盧漢，不但強調讀書計畫的重要性，也注重將很多想法寫成文章。他認為，「任何情況下，這都是鞏固閱讀和思考心得最好的辦法」（Molinaro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99）。例如，他對麥考利的愛戴和欽佩，近乎「英雄崇拜」，讓他無限嚮往高尚的自製努力；他閱讀賈斯特頓《這個世界出了什麼問題》（*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這一閱讀改變了他的一生（Marchand, P., 1989／何道寬譯，2003：20—25）。I. A. 理查茲的《文學批評原理》和《實用批評》，提出分析詩歌、培養解釋詩歌的習慣，必須更加注意實際使用的詞彙，以及詞彙的多重含義，通過語境判斷其含義；燕卜蘇《晦澀的七種類型》，使他終於學會了欣賞詩歌——如何對充斥詩歌的晦澀進行無情的解剖，也促使他將新批評作為理解和研究電子媒介的入場券；利維斯與鄧尼斯·湯普森合作的《文化與環境》（1933），說明批評家的分析能力可以用來批評文學，也可以用來批評社會環境，這使他在 1930 年代對

廣告產生興趣；曼斯費爾德·福比斯的幾節課，是麥克盧漢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最令人興奮的思想——「大量似非而是的概括，從跨距很大的領域尋找可以雜交的參照，意義高度濃縮的使人笑破肚皮的雙關語」，這種風格成為他的鮮明標誌（Marchand, P., 1989／何道寬譯，2003：37—42）。

第三，青年的麥克盧漢，懂得社交是流行的遊戲，意識到朋友在他社會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他致信給母親時說，「我很幸運，總是有很好朋友——從來就沒有少過朋友，而且是全世界最好的朋友」（Molinaro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100）。根據後來麥氏書信往來，他所稱許「最好的朋友」，至少包括溫德漢姆·路易斯、埃茲拉·龐德、菲利克斯·喬瓦內里等一批卓越的學者、同道。這種和能力相同或優秀的人「同氣相求」，和能力較低的人「友好相處」，令他終身獲益。而和西安大略大學同行「不僅學問平平，學問庸碌，思想怯懦」的接觸，都讓他「猛吃一驚」，「有所警覺」（同上引：114、190）。這種自覺和自省的態度，是他自我認識、自我解剖、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過程。

第四，麥克盧漢對英國文學和知識教育的態度變化，是理解他思維跳躍和自我警醒的標誌之一。他發現，「過去功課裡學習的片段使我得出的結論，實際上阻礙著我拓寬興趣。……我慶幸沒有成為那些不健全方法的受害者；把人從活生生的歷史中抽象出來，認為他們本身就是經典，這就是不健全的方法。我還沒有擺脫這種方法，但是我希望今後能夠擺脫。」他指出，為什麼在美國拿到一個學位就意味著教育的結束。原因很簡單：傳授知識的方法，把教育搞得太簡單化，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年輕人的頭腦就依靠這種簡化的方法，於是他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就已經消耗殆盡，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的「教育」結束了。當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麥克盧漢非常清楚，「在今天的大學裡，只教好書是一文不值的」（Molinaro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61、114）。

第五，他是如何勘破學者命運的「迷惘」？一般而言，學者註定的兩種命運：一是生前聲名顯赫，死後名聲一落千丈；一是生前寂寥無聞，死後價值得到闡發弘揚。賈斯特頓的教導，尤其是他對專家的蔑視——「毀滅人類的是專家的無知」，成為麥克盧漢終身研究的主題。就麥克盧漢的觀點來說，專家不知道的東西，沒有提到的問題，才是他的領域裡最重要的東西。英國歷史學家、散文家麥考利和梅瑞狄斯皆屬於前

者，麥克盧漢選取後者作為碩士論文《作為詩人和詩意小說家的梅瑞狄斯》的研究對象，用簡潔明快的筆調，闡釋其作品蘊含的深刻思想。麥克盧漢博士論文選擇伊莉莎白女王時代的作家湯瑪斯·納什作為研究對象。「納什的追求是成為社會學家式的新聞記者或新聞記者式的社會學家」，這很符合麥克盧漢的胃口，推動著他把語法學和「聲覺世界」——即艾略特所謂的「聲覺想像」——聯繫起來。這個「聲覺世界」是電子媒介塑造的世界，這再一次深刻地改變了麥克盧漢的精神世界（Marchand, P., 1989／何道寬譯，2003：26—29、61—64）。

貳、媒介生活中的麥克盧漢

范龍先生認為，麥克盧漢是一位由特殊經歷造就的傳播學者。這種「特殊經歷」首先表現在，作為研究媒介的權威，麥克盧漢自身就活在媒介之中。在他的日常通信之中，大量的媒介反覆地出現——書籍、照片、戲劇、講座、廣播、畫像、電報、電影、電視等、共同構成了他現實生活、精神世界的主軸，無所不在。在他生動、細膩的文筆之下，可以體會到多種媒介帶給他生活的充實與喜悅。

麥克盧漢長期將閱讀英國文學、經典著作為畢生的摯愛。以1931—1936年為例，他的閱讀範圍，涉及《哈姆雷特》、賈斯特頓《英格蘭簡史》、塞繆爾·勃特勒《埃瑞洪》、《眾生之路》，莫里哀《杜爾杜弗》、《鉑西的遺產》、《濟慈全集》、《濟慈書簡》、《瓊生戲劇》、龐德《詩章之三十》、福勒《國王英語》、《艾略特詩歌全集》、亨利·詹姆斯《擰螺絲》，馬克·吐溫《傻子出國記》、《湯姆·索耶歷險記》，維吉尼亞·伍爾夫小說《到燈塔去》，麥克斯·比爾博姆長篇小說《祖雷卡·多布森》，莫頓的《踏著大師的足跡》，這些書籍給他教益良多。隨著1937—1945、1946—1979年兩個階段閱讀書籍的整體轉向，他的學術思維和研究重心也在潛移默化地發生變化：他完成了從文學——哲學——文學批評——社會批評——大眾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學術轉向，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媒介思想家之一。

作為從「文本閱讀」向「視象閱讀」的轉折，麥克盧漢一直對電影保持著密切的關注。他在劍橋的主要娛樂似乎是看電影（Marchand, P., 1989／何道寬譯，2003：43）。1934年11月，他和博恩去看比利主演的《比利亞萬歲》，稱讚說「激動人心，製作精美」；不久，又和博恩看法國電影，表示「挺好」；1935年，去看捷克片《年輕的愛》，他認為「電

影被認為是一種新的藝術樣式，有它自己的規律和可能性」；1939 年，在威斯康辛大學期間，他常常希望當時的電影拍的更好，這樣可以和一年級新生有更多的共同話題，同時，他也敏銳地察覺到，「當前的電影是鴉片，很像真正的鴉片，到頭來，它會成為人們的宗教」(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40—44、73、118)。1939 年，他和科琳連續二周看電影：法國電影《人在旅途》和《霧罩碼頭》；1940 年戰爭期間，他們去看了一場電影，名字可能是《芭芭拉少校》；1944 年，他還和科琳去看《失蹤的女人》——希區柯克執導的最好的電影（同上引：136—141）。

電視的出現和普及，很快吸引了麥克盧漢的關注，這也觸動了他對冷、熱媒體的思考。他概括了電視的三個顯著特徵：一、電視是安靜的，相對而言是個體性的媒介，它以簡介的方式培養許多書籍文化的價值；二、電視是冷媒體，因為它的清晰度低，就像電話一樣，但是，報紙、電影和廣播是熱媒體，因為它們的清晰度高；三、電視形象是第一種使觸覺外化的技術。有了電視形象之後，我們悠久的感官分離和功能的分離，就壽終正寢了 (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307—311、330)。

麥克盧漢生活媒介之中，當然也對媒介影響充滿警惕。1943—1944 年他致溫德漢姆·路易斯的信，可以真實反映麥克盧漢對講演的看法。他多次安排路易斯的講演，透露他深刻瞭解這種媒介的性質：「對這些人而言，你越是像股票經紀人那樣的大款，他們就越敬重你」；「你可以儘量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只需把講演變成對一個眾所周知的人物的閒聊……你的生活越是和這些人聯繫在一起，她們越是興奮」；「報界的宣傳效果可以達到預期的目標」；「你認為可以加上一些街談巷議嗎？她們肯定喜歡聽這些花絮，如果這些東西使她們情緒高漲，隨後的招待會的氣氛就會很好，就會有人請你作畫」；「你可以把星期三俱樂部的講話搞成拉家常的、活潑輕鬆的閒聊，神吹一通你認識的大人物。讓她們知道，你的牌子更大，只是不直接下斷語而已」(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155—166)。這為他今後熟練應對諸多的學會講話、大學講演、電視對話、節目訪談，利用媒介達到思想闡釋的目的，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McLuhan, S. & Staines, D., 2003/何道寬譯，2006：283)。此外，他作為父親對孩子的照顧，主要表現在保護孩子不受媒介的影響。他指責穆勒·蒂姆家的孩子禮拜五晚上熬夜聽廣播劇《心靈的庇護所》，「這是在糟蹋自己的腦子」；當了爺爺以後，他建議埃里克限

制小孫女看電視的時間，他批評電視是「可惡的毒品，滲透進神經系統，尤其是兒童的神經系統」（Marchand, P., 1989／何道寬譯，2003：70）。

正是對媒介的長期浸淫和思考，使得麥克盧漢追隨利維斯《文化與環境》中提出的建議，把他在威斯康辛大學的英語文學課變成當代文化通覽課，以廣告、報紙、流行小說等作為基礎。但是，他的學術研究關注「文化與技術」，可以追溯到1944年3月他致斯坦利·墨菲神父的信，他提及希望將包括廣告、報紙、暢銷書、偵探小說等，與均質文化模式、理性有序的文化模式作對照（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178）。並開始著手「一本講當代廣告、漫畫、蓋洛普民意調查、報紙、廣播、電影等媒介的書，說的是流行的圖像，這些圖像是表意符號，含有複雜的寓意。大約70個展示的例子，每個例子用2到3頁予以說明」（同上引：219）。

他早期最成功的文章，也是沿著文化與環境的思路所做的社會批評的文章，這些文章將社會批評和「三學科」（語法、修辭和邏輯）的文學視角結合起來（Marchand, P., 1989／何道寬譯，2003：76）。推動著他從哀悼現代生活機械化向論述媒介或技術的轉向，主要是受到美國社會批評家路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1934），他筆下這個受傳播網路局限的世界，和麥克盧漢「地球村」背後的視野已經相去不遠；吉迪恩《機械化掛帥》，成為麥克盧漢終身受用的思想資源。他看到技術的基本變化如何改變人的生存的各個方面。無論多麼不起眼的人工造物，都可以揭示生活的基本模式。同樣的模式表現在哲學、廣告和最受推崇的藝術形式之中（同上引：79）。

叁、作為媒介分析家的麥克盧漢

從新批評代言人成為媒介分析家，是麥克盧漢最重要的學術轉向。1943—1944學年是麥克盧漢在聖路易大學的最後一年。就在這一年，他作為文化批評家公眾人物的生涯開始了。他和英國畫家、小說家和批評家溫德漢姆·路易斯結為朋友，他們有共同的敵人：追求轟動效應的理論、「革命的傻瓜」、廣告界、庸俗化科學。他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兒童接受的教育來自媒介而不是來自老師；教育工作者惟一的希望就是讓媒介進入課堂，就是鼓勵學生理性地分析媒介。即使到了晚年，麥克盧漢反覆重申這個主題，把它作為自己研究媒介的關鍵（Marchand, P., 1989／何道寬譯，2003：84—85）。

麥克盧漢關於媒介分析的思想，是在和朋友頻繁交往和溝通中逐漸成形。1948—1954 年間，麥克盧漢寫信並拜訪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的書信達 21 封，談論當代文學和龐德《詩章》等作品；他和菲力克斯·喬瓦內里、沃爾特·翁等人的交往，讓他不斷地切磋、思考、動筆。1951 年，他致伊尼斯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對研究傳播對社會的功能和影響，以及想搞一種傳播方面的實驗，提出一些把各專門領域聯繫起來，稱之為「多領域共同特徵的美學分析法」(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 2005: 255)。在準備《古登堡時代的終結》的書中，麥克盧漢嘗試理清文字—字母表的發明、印刷術的發明、電報是文字機械化的終極階段、廣播—電話、電影—電視，走上研究技術的道路，把它作為研究傳播的關鍵。在他看來，追溯印刷術的影響，現在追蹤媒介的轉換，不是文字的機械化、而是語詞和體態的機械化。廣播、電影、電視必然引起更大的變化，比手寫向印刷的轉換更大的變化 (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 2005: 265—270)。

1951 年，《機器新娘：工業人的民俗》的出版，給麥克盧漢帶來良好的社會反響和學術聲譽。許多「熱情洋溢的信紛至沓來，有新意也有老調。暫時還沒有批判的」(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 2005: 268)。沃爾特·翁評議《機器新娘》的文章，是「惟一有意義的文章」(同上引: 270)。儘管麥克盧漢自稱面對「被封鎖」的局面，沒有一家雜誌願意發表他的文章，但事實上，1954—1955 年，他擔任福特基金會專案的主持人，同事五人，研究生十來人，研究新媒介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研究由於聲音的機械化而產生的聲覺空間性質的變化。同時，他也在思考字母表發明以來媒介的心理動態學 (同上引: 268、280—290)。

1959 年，是麥克盧漢學術事業走向高峰的關鍵年份。3 月，他應邀赴芝加哥，向全美高等教育學會發表講話，他講演的題目是「電子革命：新媒介的革命影響」，明確提出「媒介即是訊息」的論斷——社會靠集體行動開發出一種新媒介時，它就贏得了表達新訊息的權利 (McLuhan, S. & Staines, D., 2003/何道寬譯, 2006: 2)。5 月，麥克盧漢致愛德華·S·摩爾根的信中，提出了「重新部落化」的觀點。他認為，「過去我們實現部落化靠的識文斷字，靠的是對一切思想、行動和生產做分割分析；現在，我們實現重新部落化，靠的是瞬間傳遞的資訊，靠的是電子技術；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聽覺的世界，一個同步共鳴的物理場；在這個世界中，直覺人比分析人處在更加有利的地位」(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

寬、仲冬譯，2005：295）。這些閃耀著真知灼見的論斷，在 1959—1979 的 20 年間各種會議、講座、課堂、電視、廣播等場合得到宣傳。他對新媒介、電子時代、互聯網、電話新聞、書籍的未來、人類與媒介的觀點和思想，得到國際知名人士、世界級專家、新聞主持人、電視觀眾、大學生、社會大眾的理解和接受，他突然成為世界知名的麥克盧漢，一位堪與達爾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級人物。

無論麥克盧漢如何在各種場合宣揚自己媒介理念——研究各種技術的影響，研究其與心理和社會的關係，他人還是難免對其思想產生誤解、提出質疑。為此，他曾明確說明：1974 年，他致信詹姆斯·凱里稱，「我研究技術時沒有什麼烏托邦方向或其他發現。這大概和我的象徵派訓練與批評有關，這使我採用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研究藝術與技術。這兩種方法完全排除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除非是後來附加的所謂個人自白」(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564)。1976 年，他面對主持人湯姆·斯奈德的問題，「為什麼大家覺得你難以理解呢？」他的回答幽默而犀利，「那是因為我用的是右腦，而他們用的是左腦」(McLuhan, S. & Staines, D., 2003/何道寬譯，2006：168)。

針對埃弗雷特·鄧尼斯認為麥克盧漢熱情主張並鼓吹電氣技術來消解古登堡文化的價值。他回應，「這真是離題萬里」，「凡是不熟悉詹姆斯·喬伊絲和法國象徵派的人，都不能假裝對我的東西感興趣」；「因為我的工作完全是研究技術的潛意識影響（幾乎是所有的影響），所以我開始明白，為什麼我被誤解為我所憎恨的東西的提倡者」(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580—583)。1978 年，他回應羅伯特·富爾福德的文章《會見法國的馬歇爾·麥克盧漢》——我的「艱深難解」，是因為「我根本就不適用觀點，而是只使用感知。……就我個人來說，我寧願研究模式而不研究模式。這是富爾福德感到困惑的原因」(Molinari et al., 1987/何道寬、仲冬譯，2005：621—622)。

肆、結語

保羅·萊文森肯定麥克盧漢提供的框架，可以幫助世人理解人與技術的關係、與世界的關係、與宇宙的關係。丹尼爾·傑·切特羅姆將麥克盧漢的思想視為超歷史學、神話學與傳播媒介的融合。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則認為，麥克盧漢不收集任何研究資料，不囿於分析、調查或實驗以驗證思想，他的觀點大多超越科學檢驗，無以證偽。然而，無論是

理解還是誤解，麥克盧漢都在著書立說中反復提醒世人，認識媒介對人的心靈與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一代又一代的人也不得不用他所指出的方式去感知電子時代的脈動，尋找人類電氣時代生存手段的藝術和自身身份認同的問題。他令人困惑又發人深省的講詞、語錄，仍然吸引我們去解讀他的主要著作，深入把握他深刻的思想。

參考文獻

- 何道寬（2001）。〈麥克盧漢的遺產——超越現代思維定勢的後現代思維〉，深圳大學文學院傳播系（編）《多維視界——傳播與文化研究》，頁 22—31。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 何道寬譯（2003）。《麥克盧漢：媒介及信使》。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Marchand, P. [1989]. *Marshall McLuhan: The Medium and the Messenger*. Toronto: Vintage Books.）
- 何道寬、仲冬譯（2005）。《麥克盧漢書簡》。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Molinaro, M., McLuhan, C. & Toye, W. (Eds.). [1987]. *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 by Marshall McLuhan*.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何道寬譯（2006）。《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McLuhan, S. & Staines, D. (Eds.). [2003].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